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1, 2025, pp.83-92.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1.10>



论《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中的欲望书写与伦理反思

黄家骏 (Huang Jiajun)

摘要：美国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在其作品《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中以马丁陷入与山羊的非自然情感关系作为核心事件，围绕人物之间的争吵作为推动戏剧发展的主要内容，揭示多元文化主义所造成的伦理混乱的社会现实，书写了美国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伦理危机。欲望书写是进入该文本的关键，聚焦戏剧非自然情感关系、人物之间的争吵，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伦理观造成了社会普遍的道德模糊，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混乱。更深一层而言，戏剧角色以“政治正确”搁置解决矛盾的行动，反映出阿尔比对后现代主义伦理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欲望书写；伦理混乱；伦理反思

作者简介：黄家骏，广东白云学院中文系助教，研究方向：文学伦理学批评。电邮：wxhjj2025@qq.com。

Title: On Desire Writing and Ethical Reflection in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Abstract: Edward Albee, an American playwright, in his work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centers the narrative on Martin's descent into a non-natural emo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a goat, while driving the dramatic progression primarily through the quarrels between characters. Through this framework, Albee reveals the social reality of ethical confusion exacerbated by multiculturalism and articulates the prevailing ethical crisis within postmodern American society. The Desire Writing is the key to entering the text. By focusing on the unnatural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play and the quarrels between characters, we can observe that postmodernist ethics have led to widespread moral ambiguity i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resulting ethical confusion. On a deeper level, the fact that the play's characters put aside actions to resolve conflicts in the name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reflects Albee's profound reflection on postmodernist ethics.

Keywords: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Desire Writing; Ethical Confusion; Ethical Reflection

Author Biography: Huang JiaJun, Assistant Lecture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wxhjj2025@qq.com.

引言

《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以下简称《山羊》）是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 1928-2016）在2002年发表的剧作，并于当年获得托尼最佳戏剧奖。该剧围绕男主人公马丁与其妻子斯蒂薇、朋友罗斯以及儿子比利之间的争吵展开，讲述了男主人公由于陷入与山羊之间的“非自然情感关系”，而最终导致家庭结构分崩离析的伦理悲剧。从阿尔比的创作历程上看，伦理主题一直都是阿尔比戏剧中的重中之重。对于阿尔比来说，戏剧中对出轨、乱伦、谋杀等伦理禁忌的舞台再现并不是为了简单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而设置，而是有着更加严肃的社会思考。正如《剑桥爱德华·阿尔比指南》提到：“阿尔比将他的戏剧（《山羊》）精心设置在经济繁荣的百老汇，这个剧场见证了阿尔比创作上的成就，这是一个与观众联系非常紧密的地点，他拒绝他所描绘的环境与我们的生活保持一段舒适的距离”（Gainor, J. 2005, p.200）。阿尔比的行动意在表明，《山羊》所表现出的戏剧冲突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常常被人们所忽视。阿尔比指出：“我的（写作）目标是让人们觉醒，并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加以改变”（Bottoms, S. 2005, p.249）。

目前，国内关于《山羊》的伦理研究主要分为家庭伦理、生态伦理以及非自然情感伦理等方面，其中，张琳与郭继德（2009, p.39）从生态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山羊》体现了“阿尔比在矫正当代人对待自然、对待动物问题上出现的种种偏差的同时，提醒人们保持个人‘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完整、和谐”。张定铨与周怡（2006, p.124）分析了《山羊》中欲望与性别问题的关系，并从精神分析入手指出：“弗洛伊德认为本能的欲望，特别是性欲望，是人类行为的原动力。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山羊》中所表现的几种不同方式的性行为”。学者樊晓君（2020, p.113-118）则从伦理禁忌的角度出发，认为阿尔比在戏剧中警醒人类反思美国后现代文明社会普遍存在的伦理危机问题。此外，针对《山羊》的其它研究里也会涉及对该剧作中的伦理命题的思考和阐释。

可以看到，阿尔比笔下的戏剧冲突通常与人物的欲望有着密切的联系，康建强（2015, p.9）指出，“欲望书写是文学创作的原初驱动力与核心内容，审美是文学书写的必要手段，言语是欲望书写的个性化表述与诗性创造”，因此，阿尔比对欲望的书写不仅深化了戏剧的表现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写作动因。本文试图从欲望书写的角度出发探讨《山羊》的伦理表达，揭示戏剧人物关系背后隐含的伦理隐喻，挖掘爱德华·阿尔比在戏剧中的深层伦理反思。

一、“缺乏”的焦虑：伦理僭越的发生

马丁与山羊之间的“非自然情感关系”作为对伦理禁忌的僭越，是引发戏剧矛盾冲突的核心事件，然而，其发生乍看上去却是突然的、无征兆的。男主人公马丁原本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工程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谓是工作事业有成，是过着理想的人

生。但在一次郊外出行中，马丁只是“对视”一眼就恋上了山羊，并为其取名为西尔维亚。

关于为何马丁会在与山羊注视的一瞬间就迷恋上了那只山羊，学界的解释可以主要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从家庭伦理出发，认为事业的压力与家庭生活的不如意给马丁带来了情感危机，而马丁会恋上山羊的“根源在于面对自己情感危机的失控，马丁身上的‘兽性’因子失去了有效控制，他的非理性意志控制了他的理性判断”（张连桥 2016, p.135）。一类则通常从阿尔比戏剧的自然主义倾向出发，如樊晓君（2017, p. 44）认为：“马丁对自然的向往与渴望，在现实行为中表现为，试图通过与山羊的恋爱得以释放”。这两类解释可以归为马丁陷入跨物种情感越界的客观原因，但仍未解释为何马丁忽然从传统异性恋取向转变为突破物种伦理边界的行为倾向，即马丁欲望客体与性欲结构的转移逻辑。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上看，马丁之所以走向非自然情感关系并不是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弗洛伊德（2014, p.23）在《性学三论》中提到，“所谓正常的性目的，通常指性器的结合，它可以消除性紧张，去掉性本能，其满足类似于对饥饿的满足”，而后在讨论人对动物的特殊性癖时弗洛伊德提到，通常在正常的性目的得不到满足时，人才会做出与动物性交的饥渴行为。但是，在《山羊》中，非自然情感事件的发生并非与妻子的关系破裂，在第一幕中，妻子斯蒂薇正在插花，这是为了马丁接下来要受的采访而做准备，体现出妻子对马丁的照顾与关心，因此，此时的马丁仍与妻子保持正常的夫妻关系，不会因为情感问题而作出越界的行为。

《山羊》从三个方面展示出马丁的完满人生：其一，是作为男性的事业成就的欲望得到完满，文本提到，正值中年的马丁是行业内顶级的工程师，第一幕中朋友罗斯的到来就是为了采访他——因为他获得“普利兹克奖”这一建筑业的“诺贝尔奖”，是该奖项最年轻的获得者；其二，正如上文所说，是马丁在感情与家庭中的完满，他非常满意自己的妻子，并且在剧本中多次提到他独爱自己的妻子，多年来面对其它女性的诱惑而无感，同时，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冲突爆发之前，他们的家庭处于其乐融融的状态，正如儿子比利所说：“你让我比其他孩子感觉好得多，好过许多他们的‘妈和爸’”（阿尔比 2013, p.57）；其三，是马丁在社会交际中的完满，常年以来，罗斯作为马丁最好的朋友，一直支持着马丁，出于这份信任，马丁也向罗斯坦白了他陷入“跨物种情感关系”的事实。

要解释马丁为何看似完满但其欲望却仍然得不到满足，我们必须清楚欲望为何？它从何处生成？雅克·拉康（2001, p. 602）认为：“人的欲望就是他人的欲望”，换言之，人的欲望并不由自身生产，它是从他者那里获得的，而“欲望本质上是一种缺乏或不在场的欲望”（Lacan 1991, p.223）。当马丁在中年几乎实现了所有常人梦寐以求的成就后，他发现自己仍然是空虚的，这种欲望的缺失使他陷入焦虑，进而将欲望投向伦理边界之外的对象。换言之，恰恰是因为常人认知中的正常欲望得到满足，才导致马丁突破人类基本伦理规则的限制，做出跨物种伦理越界的行为。

在马丁的口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其由于“缺乏”的焦虑而发生欲望转移的戏剧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丁的焦虑表征为记忆力衰退、妄想以及心力交瘁等一系列症状。马丁与山羊第一次相遇时处于一片田野中，而他当时去往田野的目的是想要在郊外买一处乡间别墅。在以往自然主义或生态主义角度的论述中，马丁对乡间的向往出自于其对城市钢筋水泥的厌恶，他希望自己能够在田野中找回自己已经丢失的自然性，这或

许可以作为对马丁拥抱自然的外部解释。而马丁向往郊外生活的内部原因，在于马丁从未享受过这种生活，由于工作与社会上的名利双收，马丁的社会欲望大多都得到了满足，而马丁也因此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欲望的“缺乏”。就在这时，田园生活作为马丁与斯蒂薇的共同想象，自然而然成为马丁当时新的欲望目标。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被放置在田野中的山羊是自然的喻指，“马丁在处理和山羊的关系上扮演着一个“征服者”的角色”（樊晓君 2017, p.37），这种关系隐喻着普遍存在的人与动物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如果从欲望与伦理的关系对此进行考察，则可以发现，马丁如此迅速地与山羊产生感情，一方面是出于戏剧效果：用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引起观众的思考；另一方面则是体现出马丁对欲望无休止的追求，作为一个主持过千亿项目的德高望重的建筑师，马丁买下一个乡间的别墅完全不是问题，那这个欲望实现过后呢？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更多的欲望。阿尔比在此将对马丁的欲望书写直接走向了极端，显示出阿尔比对欲望无限扩张而得不到节制所作出的警示与忧虑。

此外，马丁所参加的心理治疗场所，恰恰说明了马丁刚刚产生的欲望（在此之前他从未建构过的欲望）需要完成来自他者的社会性建构。在拉康那里，“他者是一种他在性的结构力量，是能指的场域，是主体在此完成其认同的场所”（吴琼 2011, p.31），马丁在这个协会中完成了对其兽交行为的认同与建构：即为了寻求僭越禁忌的快感，而通过将社会禁忌的内容在一个小范围内公开化，他们完成了对此不可言说之行为的符号构建。马丁在参加了协会之后也将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合理化，因此才会出现他与妻子的争辩。实际上，山羊只是马丁的欲望镜像，马丁不停地将自己的欲望强加给山羊，并予以其姓名西尔维亚，通过赋名将其私有化，而山羊本身却并没有自由意志，因此，山羊被居于参照的位置，是马丁欲望的傀儡，或者以拉康的术语来说，它只是小客体 a 的暂时填补，欲望本身仍然是匮乏的。

阿尔比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主义焦虑，那么他要么是愚蠢的畜生，要么就是麻木不仁”（Bruce J. Mann 2003, p.132）。在阿尔比的戏剧中，矛盾与冲突通常是围绕人物各种意义上的焦虑而发生和进行的。通过欲望书写的角度对马丁伦理僭越的行为进行考察使得文本的视野走向人类与文明的关系本身——即主体欲望的缺乏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焦虑，影响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与伦理状况。在 80 年代的一次访谈中，阿尔比谈到对动物的看法：“我也喜欢动物，但每样东西都必须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真实的层次，一个是象征的层次。一出戏，要想有趣，必须有两层或三层或四层”（Albee, E., & Kolin, P.C. 1988, p.90）。在《山羊》中，动物的出现成为了人类无止境的欲望的隐喻：兽交作为一种伦理禁忌，对兽交的欲望处于一种永远无法完满的状态（即不被社会所承认），而恰恰因为这种特质，马丁选择了与山羊反复性交以平复自己缺乏的焦虑，这是一种通过僭越自身“超我”与社会伦理禁忌所带来的享乐，而兽交或许在文本中的象征层次在于其隐喻着所有超出人类伦理规则的欲望之物。在此，上文所概述的阿尔比的忧虑有必要重提：在这个欲望实现过后呢？

二、争吵的本质：伦理关系的隐喻

在一篇名为《阿尔比近期戏剧中的后现代张力》的论文中，作者诺玛（Jenckes, N. 2003, p.119）在对《婚姻游戏》（*Marriage Play*, 1986-1987）、《碎片》（*Fragments*, 1993）和《三个高个子女人》（*Three Tall Women*, 1991）三个戏剧文本的分析中指出“阿尔比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斗争转化为他的情节和人物：这些戏剧是关于

这种冲突的，也是关于后现代主义时期对超越自身的新时期的竞争”。可以说，《山羊》延续了阿尔比的这一思考，剧中人物之间的争吵占据了大量的篇幅，不同角色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伦理立场，隐喻着后现代主义社会发生伦理冲突与产生伦理混乱的成因。

在讨论戏剧人物的伦理立场前，有必要对上述论文所提及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简要的梳理。现代主义通常是指笛卡尔、康德以及黑格尔以来的对理性的批判，他们“将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确定性视为知识的属性，使得这种知识观具有一种‘绝对论’的色彩”（陈嘉明 2006, p.334）。而后现代主义则将现代主义对“确定性”与“普遍性”的讨论转向了对“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讨论上来，“颠覆”“去中心化”“多元化”等是它的关键词与名片。这一转变在伦理学上表现为对一切既定伦理规则合法性的怀疑，对此，齐格蒙特·鲍曼（Bauman, Z. 2002, p.24）在《后现代伦理学》一书中说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以前从未如此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在此，《山羊》中的争吵戏可以视作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文学尝试。需要说明的是，戏中人物的伦理立场往往是通过人物对性别的欲望与态度所体现。

回到戏剧，争吵的根源在于马丁陷入跨物种情感越界这一事实，而矛盾的爆发在于罗斯寄给斯蒂薇的揭发信：罗斯是马丁多年来的好友，在得知马丁与山羊之间突破伦理边界的关系后，罗斯‘出于良心’选择将真相公之于众。然而，对于异性恋结构下的道德僭越，罗斯却持着包容的态度，即使这种行为有可能导致他口中的另一位朋友斯蒂薇受到伤害——在多年前，马丁与斯蒂薇刚陷入热恋，而罗斯也已经结婚了，但他仍然约马丁一起涉及违背婚姻伦理的不当行为。在罗斯心中，与其它女性出轨所犯的错误可能仅仅只是道德问题，而非伦理原则的崩塌，因此在听到马丁可能陷入一场婚外恋时，他并没有惊讶，反而在脑海中建构起一套异性恋叙事的欲望想象——“哇，一个美女！金发披肩……”（阿尔比 2013, p.23）。当罗斯得知马丁出轨的对象是一只山羊时，他感到难以置信，并且马上做出最激烈的反应——向马丁的妻子告密，以使得马丁马上遭受惩罚，这也是戏剧冲突前的前奏。可以说，罗斯在戏剧中持保守派的立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罗斯是一个道德十分高尚的圣人，他仅仅是对非传统意义上的性欲结构都抱着抵触的态度。

比利在剧中提到，马丁与斯蒂薇都是民主党人。在此，阿尔比强调他们的政治立场实际上是在映射他们的伦理立场。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伦理倾向，在许多议题上，民主党支持相关权益的合法化，而共和党则持保守态度。其根本区别在于，共和党的选民认为传统的家庭结构是一种天然的存在，对僭越传统伦理的法律认可会导致对这一结构的破坏；而民主党的选民则认为传统的家庭结构不存在天然的合法性。尽管马丁与斯蒂薇都是民主党人士，但他们二人之间又有一定的区别，斯蒂薇虽然思想上看似开明，但她自己的行动仍然是保守的，她从母亲那里接过一套夫妻完美生活的想象，并忠诚于自己一心建构起来的异性恋家庭，并将它打造成自己心中完美的状态——“（作广告状）……厨艺一流，窗户擦得锃亮。”（阿尔比 2013, p.42）在此，阿尔比使用“广告”一词反映了斯蒂薇对这种传统家庭欲望结构的认同与想象。

与斯蒂薇的保守相比，马丁则显得更加激进。他主动承认自己“比他们（民主党）更民主党”（阿尔比 2013, p.57），这种激进立场打破了马丁追求欲望的伦理边界，导致其最终做出跨物种伦理越界行为。在马丁为自己的辩解中，他认为自己仅仅只是婚姻出轨，他与山羊西尔维亚之间存在超越常规的情感联结，他直言道“我想……我们都

是动物”（阿尔比 2013, p.49），在马丁的视角里，他与山羊之间的这种情感理应获得理解，潜在逻辑是每个人的选择都应当获得尊重和包容。

此外，比利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阿尔比对此角色的设置是具有警醒意义的，他作为戏中一定程度上的旁观者实际上也映射出观众的处境。在戏剧中，比利面对父母争吵时的立场是摇摆不定的，这是因为比利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本就会遭到一定的困扰。当然，这种模糊的立场也源自于父母伦理观念的冲突与混乱：他一方面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反感自己的父亲陷入跨物种伦理越界这一事实。而在面对罗斯的质疑时，比利的歇斯底里以及对父亲的短暂包容，则展现出其伦理观念的彷徨。在这样的伦理环境中，比利不仅迷失了自我的伦理身份，也同父亲一样有着僭越伦理禁忌的危险。

综上，马丁、斯蒂薇与罗斯三人的争吵本质上是三种不同伦理立场的交锋。保守派罗斯坚持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原则是不可僭越的；斯蒂薇作为略保守的自由派，对那些还未被完全接受的新事物保持宽容的态度，但对于不可想象的伦理禁忌则是坚决地制止；马丁作为激进的自由派则秉持弗洛伊德式的泛性论思想，即马丁认为现代文明提倡的性道德观“导致对生活的普遍焦虑”（弗洛伊德 2014, p.123），于是对一切能够满足享乐的事物来者不拒，解构了伦理准则的合法性。可以看到，阿尔比通过对一个家庭内所发生的争吵的书写，将当代美国身份政治问题具象化，指出了后现代主义伦理语境下因“道德模糊”而造成伦理观念的混乱。学者王建勋（2019, p.58）指出，后现代主义下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天然倾向是质疑和反对主流文化”——即通过质疑一切“本质主义”伦理/文化的合法性，反而赋予了一切伦理/文化合法性的事实，人的欲望也得以在现实中无限扩张。同时，阿尔比的写作意图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这一事实的批判，通过文学性叙述，阿尔比继续描绘出了这一思潮可能导致的家庭伦理崩塌、跨物种伦理失范、未成年人成长困境等伦理混乱图式，展现了在后现代思潮的发展下普遍存在的社会伦理危机。

三、激进的保守：后现代伦理的反思

爱德华·阿尔比在总结《山羊》时说道：“所有的文明对其宽容度都有着专断的限制。本剧表现了一个家庭如何被一桩无法想象的事件深深地动摇以及他们如何解决这困境。我希望人们对于自身价值观的合理走向予以崭新的思考”（阿尔比 2013, p.65）。这段话体现了爱德华·阿尔比对于 21 世纪初来势汹汹的后现代主义伦理的反思，也表明《山羊》的重点并非是为了强调：“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世界的割裂造成的贫瘠，最终造成人的精神世界的虚空和人性的不完整”（雷瑜 2022, p.117），在此，学者雷瑜的解读将马丁与山羊的恋爱视为激进的解放或许背离作者与作品原意。学者樊晓君指出：“阿尔比对后现代文明的伦理危机的关注由来已久，只不过在《山羊》中有更为集中的展示和描写”（樊晓君 2020, p.116）。上文两章节的分析以及对以往研究的考察表明了阿尔比在《山羊》中所要表明伦理立场与伦理态度，本小节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在爱德华·阿尔比的创作历程中，《山羊》体现了阿尔比怎样的伦理坚守和转变？

在阿尔比早期的戏剧作品中（1949-1969），就开始表现出了对欲望的克制与警惕。在阿尔比第一部登上舞台的作品《动物园的故事》（*The Zoo Story*, 1958）里，阿尔比就开始注意到不加克制的性欲望对家庭与整个社会带来的灾难，此时阿尔比批判的对象是个人主义下的自私自利与由此造成的人际隔阂，这种思考与阿尔比曾是孤儿的身世有关；随后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1962）中，主

人公乔治与玛莎受到同期社会欲望的影响而无法承受不孕不育带来的不可承受之重——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社会风气认为“没有孩子的婚姻是不完整的”（Kline Wendy 2001, p.155），于是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儿子，而后又因夫妻之间的矛盾将他“杀死”，阿尔比对这种社会异化欲望采取了一种嘲讽的姿态；在改编剧《欲望花园》（*Everything in the Garden*, 1967）中，阿尔比批判了理查德夫妇在拜金主义下的欲望膨胀，揭露了人的欲望被金钱异化的事实，这与阿尔比另一个戏剧《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 1960）异曲同工。可以看出，在创作生涯开始，阿尔比就聚焦于欲望的异化与膨胀进行了书写，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此时的阿尔比在创作中的指向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受收养家庭背景与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影响，在作品中“通过对语言规范的挑战，打破了两性语言的性别差异和界限”（袁家丽 2019, p.132），对传统社会与家庭中的性别、政治等权力关系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反叛；另一方面受美国传统新教伦理的影响，对不受节制的欲望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也对“反文化运动”中过度激进的各种解放表示质疑。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阿尔比的戏剧创作进入了第二阶段（1969-1989）。五月风暴发生于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一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运动的思想纲领主要为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以及情境主义等。五月风暴在哲学和行动上的突出贡献在于其走上了一条当时法国青年未曾设想的道路，即打破旧的、不合理的秩序，建立起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新秩序与新结构。次年，美国在五月风暴余波的影响下引发了反文化运动，阿尔比受这两场运动的影响创作了戏剧集《箱子—毛—箱子》（*Box-Mao-Box*, 1968），通过戏剧行动将旧有结构“倒塌的过程戏剧化，使观众认清幻象之后的现实”，同时，阿尔比大胆“预示社会主义的理想实践也许是解决西方文化危机之途”（范煜辉 2016, p.147）。《箱子—毛—箱子》通常被认为是阿尔比转型时期的实验作品，从伦理视角上看，它也的确符合“转型”一词的定义，在这部作品中，阿尔比将视野从家庭情境剧开始转移到人的政治生活中，其伦理立场也倒向了更加自由开放的空间。随后的《海景》（*Seacape*, 1974）与《三臂人》（*The Man Who Had Three Arms*, 1981）采用了非自然叙事的写作手法，《海景》以从海上出现的人形蜥蜴与身为人类的查理夫妇之间的交流揭示了现代文明“退化与进化并存”的矛盾，戏剧中查理对屡屡出现的喷气式飞机的态度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和人性的摧毁力量”（张琳、郭继德 2009, p.34），反映出作者对物化社会的鄙夷与对新社会的呼唤；而《三臂人》则以主人公“他自己”（himself）长出第三只手臂前后的异化之旅反映了资本主义“扭曲的价值评价”（张连桥 86），显示出消费社会的腐朽。期间，阿尔比仍然关注家庭问题，如《寻觅太阳》（*Finding the Sun*, 1983）与《婚姻游戏》揭示了家庭伦理的困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阿尔比仍然坚守传统清教的伦理观，但对欲望的批判却更多地转向了政治维度，在解决方法上，阿尔比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也更倾向于社会出现新的变革。

进入爱德华·阿尔比创作的第三阶段（1989-2009），可以看出阿尔比已经开始对五月风暴后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了一定的反思。今天，“五月风暴已经成为历史的徽章和标志。它作为历史事件不仅是历史学的记载对象，而且是哲学的沉思对象”（于奇智 2009, p.152）。但正是因为作为事件，五月风暴这一能指很容易被西方极端自由主义所挪用，正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言：“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留给今天的是很容易就能被整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的享乐主义。对各种极端体验的追求出现在一个特

定的时刻：‘68 年精神’已经耗尽了它的政治潜力”（转引自连小丽、王小会 2009，70）。阿尔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曾经革命的思潮被用于消解道德合法性的危险，随后的《三个高大女人》通过三个女人的叙述以及对戏剧空间的碎片化描写显示出“稳定的个人意识的缺乏”，使得整个戏剧“充满了对整个世界观的后现代的不信任”（Suwalska-Kołecka, Anna 2009, 107-111）。如果说，《三个高大女人》仍更多是从家庭空间出发去探寻后现代下人的生存问题，《山羊》则往政治空间更进了一步，如前所述，通过对《山羊》中四人争吵的描写，阿尔比展现了在后现代思潮的发展下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同时阿尔比也指出了后现代的伦理困境，即多元文化主义下的“个人解放”很容易使主体忽视了他者的存在，提倡极端个人化的欲望会损害其它主体的权利，就像马丁的跨物种情感关系给妻子斯蒂薇与儿子比利带来的冲击。有研究者（Craig, L. & Albee, E. 1992, p.52）评价道：“仔细观察，在今天最刻薄的戏剧家往往被证明是最道德的。阿尔比谴责年轻一代不是因为他们大肆宣扬的‘孽’，而是因为他们拒绝理解传统的有效性，而过去的传统是如此勇敢地将混乱转化为秩序”。这段 90 年代对阿尔比的评价恰好体现了《山羊》的主题，也昭示了阿尔比看似道德保守书写下的真实意图。阿尔比并没有被文化多元主义看似解放的话语所迷惑，他在戏剧情节中剖析了后现代主义中多元文化主义倾向暗藏的危险与不稳定因素。

从《山羊》开始，阿尔比对自己创作的第二阶段有了更多的反思，阿尔比的作品相比上一个时期更保守、更道德了，这既是时代环境的选择，也是阿尔比一直以来的伦理坚守——即从一开始，阿尔比就非常注重作品的伦理教诲作用。如此看来，阿尔比在《山羊》中所体现的保守姿态在这个普遍提倡解构一切的时代反而是激进的，因为阿尔比注意到在这种抽象的激进下有可能或已经引发一系列伦理矛盾，并且及时对这种现象与趋势踩下了“刹车”。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给阿尔比颁发“国家艺术勋章奖”时的致辞写道：“今晚我们的国家——在反叛中重生的国家——高度赞美你，爱德华·阿尔比。在你的反叛中，美国戏剧获得重生”（Mel Gussow 1999, p.3）。从上文的分析看来，阿尔比的反叛不仅在于戏剧形式的革新，也在于对社会思潮的不断反思与反叛，我们在阿尔比戏剧创作的每个阶段，都能看见作家在不断调整自身的思考，这也是阿尔比的戏剧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结语

概言之，《山羊》讲述的是一个当代社会正在时刻上演的悲剧。爱德华·阿尔比有意将马丁的欲望引向当代人无法接受的极端，并让戏剧中的四位角色用争吵来展现出情节背后那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后现代主义中“身份政治”存在的弊端。首先，爱德华·阿尔比在《山羊》中对跨物种伦理越界行为的书写并非只是为了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而是以一种极端欲望追求的展示将观众引向剧场反思的空间，意在对 21 世纪初美国的伦理思潮与伦理现状作出批判与反思，告诫人们对欲望的追求要适可而止，否则将会走向深渊，在此，“山羊”是所有冲破限制的禁忌行为的隐喻，而对这种伦理僭越的欲望书写一直是阿尔比创作的关注点。再之，阿尔比并不认同后现代主义对道德合法性的解构。在此，聂珍钊教授指出了当前一些文学作品所走进的误区：“在现在的一些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里，人的本能和人性被混淆了，人的本能往往被当成人性加以颂扬和肯定，由于人的本能被当成了人性，因此人的本能或被肯定，或被歌颂。显然这是一种需要注意的倾向”（聂珍钊 2010, p.19）。可以看到，阿尔比非常注重戏剧的伦理

教诲作用，在《山羊》中以严肃的态度处理人性与欲望的关系。最后，尽管在《山羊》里阿尔比没有直接提出任何确切的解决方案，仅提供了一个定格的悲剧画面，使观众陷入沉思，但回顾阿尔比的创作，可以看出，阿尔比认为“与他者的关系”是个人作出伦理选择时首要考虑的，无论是《动物园的故事》抑或是《美国梦》等作品都提出了关于当代社会中人际藩篱的思考，这种对主体间性的重视可以看作阿尔比对当前伦理困境的一种解决路径。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美国戏剧中的悖论诗学研究”（项目编号：21YJC752024）系列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爱德华·阿尔比（2013）：《山羊：阿尔比戏剧集》，胡开奇译。新星出版社。
- [Albee, E. (2013).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translated by Hu Kaiqi. New Star Press.]
- Albee, E. & Kolin, P.C. (1988).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Albe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Bottoms, Stephen (Ed.) (2005).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ward Albe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aig, L. & Albee, E. (1992). "Edward Albee." *BOMB* (38): 52-55.
- 陈嘉明（2006）：《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 [Chen, J. M. (2006). *Fifteen Lectures on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樊晓君（2017）：“禁忌与替罪羊：阿尔比戏剧《山羊》的荒诞性阐释”，《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03): 43-47。
- [Fan, X. J. (2017). "Taboo and Scapegoat: The Absurd Interpretation of Albee's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3): 43-47.]
- 樊晓君（2020）：“严肃与戏谑：阿尔比戏剧《山羊》的伦理禁忌叙事批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05): 113-118。
- [Fan, X. J. (2020). "Seriousness and Irony: Ethical Taboo Narrative Criticism in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05): 113-118.]
- 范煜辉（2016）：音乐、毛泽东与资本主义的衰落——论爱德华·阿尔比的《箱子—毛—箱子》。《中外文化与文论》(01): 138-147。
- [Fan Yuhui (2016): Music, Mao Zedong and the Decline of Capitalism —— On Edward Albee's *Box-Mao-Box*.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01):138-147.]
- Kline Wendy (2001). *Building a Better Race, Gender, Sexuality, and Eugenics from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o the Baby Bo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ainor J. (2005)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dward Albee*. In Bottoms, S. (Ed.)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6.
- Jenckes, N. (2003). *Edward Albee: A Casebook*. In Bruce J. Mann (Ed.). Routledge: 109-120.
- Lacan (1991).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 translated by Sylvana Tomaselli. Norton.
- 雅克·拉康（2001）：《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三联书店。
- [Lacan, J. (2001). *Ecrits*, translated by X. Q. Chu.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雷瑜（2022）：“西尔维娅是谁？——《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的后人文主义解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第2期：110-120+160。
- [Lei Yu (2022). Who is Sylvia?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umanism.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02): 110-120+160.]

Mc Gussow (1999). *Edward Albee: A Singular Journey: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康建强 (2015): “文学、欲望书写与审美”, 《甘肃社会科学》(05): 6-9。

[Kang, J. Q. (2015). “Literature, Writing Desire, and Aesthetics”. *Gansu Social Sciences* (05):6-9.]

连小丽、王小会 (2009): “齐泽克论 1968 年 ‘五月风暴’”, 《国外理论动态》(04): 70-72。

[Lian, X. L., & Wang, X. H. (2009). “Zizek on the ‘May Storm’ in 1968”. *Foreign Theoretical Dynamics* (04): 70-72.]

Bruce J.Mann (Ed.) (2003). *Edward Albee: A Casebook*(pp.131-142). New York: Routledge.

聂珍钊 (2010):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 《外国文学研究》(01): 12-22。

[Nie, Z. Z. (2010).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1): 12-22.]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Nie, Z. Z. (2014).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齐格蒙特·鲍曼 (2002): 《后现代伦理学》, 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Bauman, Z. (2002). *Postmodern Ethics*, translated by C. G. Zha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王建勋 (2019): “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秩序的冲击”, 《当代美国评论》(02): 48-67+123。

[Wang, J. X. (2019). “Identity Politics,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American Order”.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view* (2), 48-67, 12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2014): 《弗洛伊德文集 05——爱情心理学 (车文博主编)》。九州出版社。

[Freud, S. (2014). *Freud's Collected Works 05: Psychology of Love*. In W. B. Che (Ed.). Jiuzhou Publishing House.]

Suwalska-Kołecka, Anna(2009). Fragmentation and Discontinuity in “Three Tall Women”. *Hungarian Journal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01): 107-111.

吴琼 (2011): 《雅克·拉康: 阅读你的症状 (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Wu, Q. (2011). Jacques Lacan: *Reading Your Symptoms (Part I)*.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袁家丽 (2019): “权力的游戏”: 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 中的性别政治与文化协商。《戏剧艺术》(02): 123-132。

[Yuan Jiali (2019). “The Play of Power”: Gender Politics and Culture Negotiations in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Theatre Arts* (02):123-132.]

于奇智 (2009): 五月风暴与哲学沉思。《世界哲学》(01): 152-158。

[Yu Qizhi (2009). May Storm and Philosophical Meditation. *World Philosophy* (01): 152-158.]

张定铨、周怡 (2006): “马汀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读阿尔比的新作《山羊》”,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00): 119-127。

[Zhang, D. Q., & Zhou, Y. (2006). “What's Wrong with Martin? ——Read Albee's New Book *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The Collec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tudies* (00): 119-127.]

张军 (2014): “‘政治正确’与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 《江海学刊》(05): 193-198+239。

[Zhang, J. (2014).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merican Cultural Marxism”.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05): 193-198, 239.]

张连桥 (2016): 《身份困惑与伦理选择——爱德华·阿尔比戏剧研究》。科学出版社。

[Zhang, L. Q. (2016). *Identity Confusion and Ethical Choices--A Study on Edward Albee's Drama*. Science Press.]

张琳、郭继德 (2009): “从《海景》和《山羊》看爱德华·阿尔比的生态伦理观”, 《外国文学研究》(01): 32-39。

[Zhang, L., & Guo, J. D. (2009). “Edward Albee's Ideas of Ecological Ethics in *Seascape* and *The Goa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1): 32-39.]